

惠栋手批本《渔洋山人精华录笺注》考辨

郭立暄

清康熙年间,王士禛《渔洋山人精华录》刊刻后,有惠栋《训纂》、金荣《笺注》二家注释本行世。查慎行、何焯、杭世骏、惠栋、翁方纲、丁晏等曾在各自所持的版本上,以亲手批点的形式抒发心得。后来藏家又依据所见,辗转过录诸氏批语。上海图书馆藏有一部金荣《渔洋山人精华录笺注》,清金氏凤翔堂刻本,有惠栋批(书号798300-05),书中批语已为学者利用。比如近年周兴陆先生辑有《渔洋精华录汇评》,将诸家批语汇萃一书,特别收录了该本的内容^①。不过,笔者在查阅上图原书时偶然发现,前人对该本批语的认识存在一些误解,有重加审核的必要。

一

金氏凤翔堂刻本《笺注》,我所见的印本均未题刊刻岁月,黄永年先生定为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刻^②,但书中“弘”字已缺笔,黄说恐未确。该书“凡例”已提及雍正甲寅,说明该本刻年当不早于雍正十二年(1734)。黄氏依据者为蒋介青旧藏本,有乾隆二年(1737)金氏补选《续录》一卷,则初刻当不晚于乾隆二年。意者该本刻在乾隆元年,次年又有补刻。上图这个本子的内封面题“凤翔堂藏版”,还钤有“姑苏阊门外枫桥小桥浜徐宅发兑”的朱文戳记,是真正的原版,且《续录》尚未附入。凡例首叶钤有“吴县潘氏彦均室藏”白文长方印,书前有潘承谋手书跋语云:

金林始《精华录笺注》与惠定宇《精华录训纂》所注固不同。惠诋金谓窃其稿而增益谬误,遂著《辩讹》一卷,附于《训纂》之后。按集中诗篇亦金多于惠,其亦有增益耶?省安记。

按,潘承谋(1874-1934)字聪彝,号省安,又号铁仲,吴县人。庠生,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顺天副榜,官至农工商部主事^③。有《瘦叶词》一卷,民国二十

①《渔洋精华录汇评》附录一,齐鲁书社,2007年,第586页。

②黄永年、贾二强:《清代版本图录》卷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叶一〇五。

③《大阜潘氏支谱》,潘氏家印本,1993年,第391页。

三年(1934)刘翰臣捐资石印行世。

潘氏此跋提到金荣的一段抄袭公案,在此略加说明。惠氏《训纂》刻成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较金氏《笺注》晚出。按金荣的说法,《笺注》缘起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殚力搜讨二十余年,至雍正十二年注稿始粗定。次年乙卯(1735)秋,他于友人处得惠栋注本,录之以补己所未逮^①。而惠栋的说法,《训纂》既脱稿后,金荣始集为《笺注》一书,取惠注参错注之。间有增益,皆浅近习见之语,又多谬误^②。比较二书不难发现,《笺注》错的多而且低级,更象是一部速成的稗贩之作,其中不乏由于抄袭惠注时误会原意而衍生出的可笑讹误,因此后来学者大都认同金袭惠注事实确凿,无可遁避。

在上图的潘氏彦均室旧藏本(以下简称潘本)中,惠栋以墨笔批注的方式,纠正金荣《笺注》之误不下数百条,这些内容后来大多被收入刻本《笺注辨讹》中。惠栋另有一些揭露金荣剽窃的话,比如金氏在“凡例”中说“近体中注,兼采之徐君(夔)龙友”,惠氏抹于旁,复于书眉批“讳窃为采,大干法纪”;卷五末《江行望乌尤山》,惠氏批“采惠注而讹者十二三,盗惠注而有者十八九”。这类语句则并未被收入刻本。

由于潘本中墨笔批语中多提及“惠注”如何如何,今人或据此以为系后人过录。这部惠栋手批的精本,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竟未见著录,恐怕与这种理解不无关系。其实,这种理解存在严重的误读,“惠注”只是惠栋表述自己著作的一种方式。王欣夫先生为此提供了一个旁证,他曾亲见过彦均室的藏本,认为惠氏手校,因向潘承谋借来传录一本^③。更有说服力的当然还是笔迹的比对,上图现有《周易本易辨证》、《明堂大道录》等多种惠氏著作稿本以及明世德堂本《荀子》等多种惠氏批校本,将诸本与潘本并几而观,笔迹完全一致,可知潘本墨批(图1)确出惠栋之手。

潘本中朱色批语(图2)与墨批字迹迥不相同,以墨批作为鉴别的标准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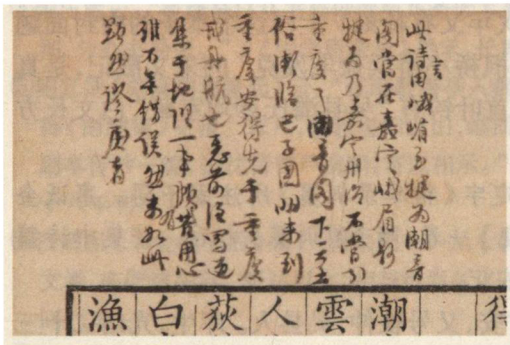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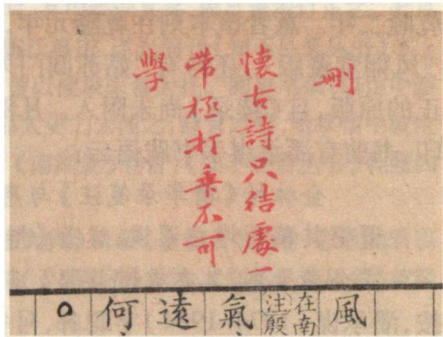


图2

①金荣:《笺注》前附“凡例”,清金氏凤翔堂刻本,叶三。

②惠栋:《金氏精华录笺注辨讹》,清乾隆惠氏红豆斋刻本,叶一。

③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癸卯稿”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31页。

可知朱批决非惠栋手迹。当然,这一事实只能证明将朱批手迹归为惠栋有误,并不能绝对地证明朱批的内容不出自惠栋。事实上,潘本中夹了不知谁氏所书一纸,云“潘承谋过录惠栋批”,仍将朱批归于惠栋。将卷中朱批与卷首潘跋之手迹作比对,可发现二者体式不同,当非一人所书。夹签称朱批出潘承谋手,并无徵验;称批语内容属于惠栋,恐怕也是意必之辞。看来,这位无名氏的判断同样经不起推敲,不能据以为信。

二

令人产生疑问的还有朱批的内容,其中对渔洋诗加以赞誉的固然不少,但给予批评者更多,这些批评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一是对渔洋山人某一首诗局部或整体写作缺陷的批评,如卷一,《冬日偶然作四首》评:“平平敷陈,未见所长。”《慈仁寺双松歌赠许天玉》评:“结四句松甚。”《洗象行》评:“起平无势。”《题赵澄仿王右丞群峰飞雪图》评:“以赞画结,无力。”《林皋和尚塔院观林公泉》评:“少味。”卷二,《春申涧上》评:“落怀古套。”卷三,《咏史小乐府二十四首》评:“但咏三国史,中无卓见,铺叙而已。”

二是通过与前代诗人或诗作的比较,指出渔洋之所短。如卷三,《萧尺木楚辞图画歌》评:“先生七言古时造唐人门仞,惟沉郁顿挫处尚少,难与少陵作替人耳。”《题孙豹人小像》评:“宋人中下驷。”卷五,《马鞍山岭》评:“连用‘或如’,未免落昌黎窠臼。”《登高望山绝顶望峨眉三江作歌》评:“李、杜胜人处,全在空际跌宕。新城能实而不能虚,所以不逮古人。”

三是揭示某些渔洋诗写得不好,客观上为后学提供了坏榜样。如卷一,《读史杂感八首》评:“此种尚欠卓识,近人学步者甚多。”卷三,《江上读韦诗》评:“末一点开近人易径。”《上巳辟疆招同邵潜夫陈其年修禊水绘园八首》评:“此新城诗之下者,近人却多效之。”

以上几项,说的还是渔洋作诗的水平,另一些评语则直指渔洋作诗间有偷奸耍滑的毛病。如卷一,《醴泉寺高阁瞻眺有怀范文正公》评:“怀古诗只结处一带,极打乖,不可学。”《秋柳四首》评:“不能刻画,而以填写掩其疏漏。此少年欺人之作,而一时推许,遂不复割爱。读者勿以盛名所在而一概护短也。”卷四,《瓶中荷花开偶成二首》评:“于题太离,此打乖之作,不可学。”这就牵涉到渔洋为诗的态度问题了。对于王士禛这位清初的文坛领袖而言,这样的批评可说是极不客气。

王士禛诗风行海内数十年,作品数量庞大,水平参差不齐确是事实。对于他具体的某一首诗给出批评的意见,本来不足为怪。奇怪的是,这些批评被认为出自惠栋之手。我们知道,惠栋对王士禛素来服膺,他所著的《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卷端题:“小门生东吴惠栋定宇撰”,以渔洋门人自居,对渔洋秉持谦恭的态度。偶而评诗,不自觉流露出的也是渔洋声口,比如他为吴竹屿《古香堂

集》作序,开篇便说:“昔人言:诗之道,有根柢焉,有兴会焉。镜中之象,水中之月,相中之色,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此兴会焉。”^①就是例证。惠栋的先辈与王士禛有两世交谊,“惠子之祖研溪先生周惕,为渔洋辛未(清康熙三十年,1691)所取士;而尊人半农学士士奇,又亲炙渔洋之门。两世渊源,渐渍浹洽。”^②具有这样家世背景的惠栋,一转脸却在批本中对作为前辈的王士禛严辞批评,丝毫不假辞色,不能不让人感觉惊讶。

从上述评语看,批者对历代诗歌的源流正变极为谙熟,对诗歌艺术创作得失评价极为自信。他应该是一个以写诗为主业,且具有相当地位与声望的人。惠栋虽然不废吟咏,但一生精力主要在考订经义,为诗只是馀事,他的学术背景与批者不相符合。所以我怀疑,上图这个惠栋批本中朱色批语并不出自他之手,而是另有所属。

三

朱批出自何人,从潘本内部无法找到证据,只能外求旁证。上海图书馆藏有另一部凤翔堂原刻本(书号 572966-75),卷端钤有“陆敦廉印”朱文方印、“重山”朱文长方印。开卷有“玄冰室珍藏记”朱文长方印,为袁荣法旧藏。袁氏《刚伐邑斋藏书记》著录,称此本“书眉有先世父据经史补笺颇多,又有前人摘录惠栋之说,并他家批注者”^③。检对原书,发现袁本中也有朱、墨二色批语。

墨批之中,一部分内容出自惠栋,与潘本中的惠氏手批文字相同或接近,这些批语中有些加注“惠栋云”字样,有些则没有。另一部分与潘本中惠批文字绝不相同,疑为袁荣法所称其“先世父”的补笺。袁本中可确定为惠栋批的条目较潘本为少,或许确如袁说,此本的惠批经过前人摘录,已非全貌。

朱批内容与潘本中的朱批对照,二者大致相同,所不同者,此本的每条朱批上都注“归愚云”。朱批内容出自沈德潜,这一提示为考订提供了重要线索。不过,考虑到朱批是后人传录时所加,该提示的真实性仍有待检验。

沈德潜曾编选《国朝诗别裁集》^④(以下简称《沈选》),王士禛诗列在卷四,选录达三十四题、四十七首之多。在这三十四题中,潘本、袁本无朱笔批语的仅有八题,分别为《余澹心寄金陵咏怀古迹诗却寄二首》、《送张篴山学士归庐陵》、《国士桥》、《龙门阁》、《朝天峡》、《天柱山》、《皖城怀古》、《螭矶灵泽夫人祠》。这八题部分句下,《沈选》有圈点,如《朝天峡》末二句“风便黎州

①惠栋:《古香堂集序》,《松崖文抄》卷二,《聚学轩丛书》本。

②卢见曾:《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序》,《雅雨堂文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4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2年,第467页。

③袁荣法:《刚伐邑斋藏书记》,台湾“中央图书馆”,1988年,第664页。

④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传世有三本:一初刻三十六卷本,一教忠堂重刻三十二卷本,一钦定三十二卷本。初刻本为未定型的文本,钦定本则经过南书房诸臣的审改,已非作者本意。本文只取教忠堂重刻三十二卷本作讨论。

城，茫茫波涛白”句下加圈，《龙门阁》首二句“众山如连鳌，突兀上龙背”、中间二句“万壑争一门，雷霆走其内”加圈，潘本中同诗也有朱笔圈点，位置正同。其余二十六题，潘本、袁本均有朱批，几乎全是肯定与赞许之语，批驳的话则一条也找不到。试举例如下：

《丹徒行吊宋武帝》，评“有力”；

《题尤展成新乐府》，评“小杜风流”；

《潼关》，评“雄杰称题”；

《雨度柴关岭》，评“沉雄”；

《沔县谒诸葛忠武侯祠》，评“神完气足，起结有力，盛唐中亦推上乘，那得不传”；

《定军山诸葛公墓下作》，后半评“何等神勇”；

《五丁峡》，评“老杜”；

《晚登夔府东城楼望八阵图》，评“调高力大，味厚气雄，不似嘉、隆间人只办得唐人面目”；

《度河西望有感》，评“少陵后罕见此种笔墨”；

《和徐健庵宫赞喜吴汉槎入关之作》，评“传作”；

《苻离吊颍川侯傅公》，评“生面独开”；

《采石太白楼观萧尺木画壁歌》，评“以浩气行之，凌空飞动，不以填缀见长”；

《题赵承旨画羊》，评“格律严，措辞雅，‘南渡’一联，近人那能措手？四面八方说来赵承旨无处生活，然出以温文之笔，无一点怒张习气”。

由此看来，渔洋山人诗作中，朱批者认为的佳作，几乎都被沈德潜选入《国朝诗别裁集》，这显示出二人文学趣味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我们当然可以说，这只是偶然巧合而已。那么不妨再看下面的例子。

《沈选》中间有沈德潜的评语，潘本中同诗有朱批。前者是全诗评语，以双行小注形式，列在渔洋诗后；后者是针对一诗中某几句作评价，分为数段。如卷六《戴嵩牛图》，中间“风景略与画图中”句，潘本朱批：“推开发论，少陵嫡派，层层收足”；末尾“童牛不牯可三叹”句，朱批：“‘童牛不牯’，暗指藩孽，妙于典切”。《沈选》同诗批云：“以画牛引起太平时田家风物，至吴、耿、尚三逆叛而此景不复见矣。末以‘童牛不牯’意作结，层层收束，是何本事。”校读两文，构造虽异，大旨则同。卷七《秦中凯歌》，袁本朱批：“诸咏声光赫奕，得颂扬本朝之体。视‘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暄按：此沈明臣《凯歌》句），尚是书生语耳。”《沈选》同诗批云：“前明徐文长、沈嘉则诸《凯歌》非不锋利，然皆书生之习未除，读此知为庙堂之作。”二者词句如出一辙。

《笺注》中某些诗题下有多首诗，《沈选》并未全录。潘本的朱批指出诗题下几首诗（或某一首）作得特别好，无独有偶，沈氏也作同样选择。比如《马嵬怀古二首》第二首“巴山夜雨却归秦”，潘本书眉有朱批：“绝唱。前首可不

存。”对照沈选,恰好取了第二首。《秦淮杂诗十四首》第八首“新歌细字写冰纨”,潘本书眉有朱批:“诸咏风流绝佳,要以此首为最。”《沈选》也恰好取了第八首。

沈德潜操选政,每好替前人改诗。对于王士禛的诗,也不免技痒。《沈选》中王诗《谒文忠烈公祠》“姓名留重《党人碑》”句,沈氏批注云:“原本‘留冠《党人碑》’拟易‘重’字,谅渔洋亦不以为妄也”,明说自己所改字。取潘本覆核,《笺注》原书果然作“姓名留冠《党人碑》”,有朱笔将“冠”字改为“重”。

以上三项,均是沈德潜极为个人化的操作,朱批竟一一符合,这已无法再用“巧合”来解释。试将以上诸节熟复一过,则朱批内容属沈归愚有确证,断然不可易。至此可知,上图藏潘本的批校项应著录为“惠栋墨笔批,佚名朱笔录沈德潜批”。

四

沈德潜对于《渔洋山人精华录笺注》施加批语,似乎并非闲适的消遣,而是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在批点全书一过后,他自认对渔洋诗之优劣已了然于胸,遂将符合自己审美趣味的作品收入《沈选》^①,不符合自己趣味的或不佳的作品就不予收录了。从这一角度看,沈氏手批本为《沈选》卷四的编辑作了素材的准备。批本书眉的某些评语词句显得比较随性,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它们被加以润色后收入《沈选》,从这个意义上说,前者又可视为后者的初稿。这一手批本或许久已不存于天壤之间,但其内容已通过传录的方式流布开来,潘本与袁本的朱批均为其嫡裔。又,我们今天读到的《沈选》卷四,并不能反映沈氏对渔洋诗的全部看法。只有读了朱批,我们才能知道沈氏为什么选一些诗,这些诗的好处在什么地方;也才能了解他为什么不选另一些诗,那些诗在创作技巧手法上有什么毛病。因此对于文学批评研究而言,朱批的价值不可低估。

《汇评》共收录潘本的朱笔批语计一百余条,或许是过于依赖图书馆的著录,编者将其全部归为惠栋。现在看来,这一百余条批语无疑当属沈德潜。此外,《汇评》书后附的“批点本提要”提及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林佺写刻本《渔洋山人精华录》^②,有朱、墨笔批点,其中朱批与潘本多同,这部分批语也应归为沈氏。潘本、袁本、上师大本的朱笔批数目并非绝对地一致,个别条目存在此有彼无的情况,参合三本,庶几可得沈批全貌。

需要说明,《汇评》对某家批语的认定偶有一失,不足为病。何况上图的著录本身有不够严谨之处,也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读者对批语归属的判定。我认

^①沈德潜注云:“(渔洋)全集以明丽博雅胜者居多,然恐收之不尽,特取其高华浑厚、有法度神韵者,觉渔洋面目为之改观。”(《国朝诗别裁集》卷四,教忠堂本,叶一)

^②据笔者审核,此本实为清代翻刻本,并非林写原本。

为《汇评》是一部很优秀、很有特点的著作,其长处就在于能充分利用分藏于各公共图书馆的古籍批点本原件,揭示前人评语,这种工作方法在目前学界实属难能。若能于再版时稍加改进,本书将更完美。

结 语

批校本的鉴定是古籍版本鉴定中的重要一环,它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批校字迹的辨认,二是对批校内容归属的判定。尤其是对后者的认定,不仅涉及古书版本鉴定的实践,也与文学批评的专业知识密切相关。上图所藏的惠栋手批本《渔洋山人精华录笺注》本身包含了多重鉴定难点,为准确地鉴定批校本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这个本子在使用过程出现了失误,又说明了一个事实:古籍版本的前期鉴定与后期整理这两项工作很大程度上由藏书机构与科研机构的工作者分工完成,后者在利用古籍时又相当依赖前者的著录,这一情况在今后相当长的阶段恐怕不会改变。因此,前者在鉴定中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马虎,会使文献整理工作偏离走向;前者在著录中一些不起眼的疏漏,会在利用过程中被无限放大。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图书馆工作人员记取。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图书馆